

## 悼念: 令人心痛, 令人惋惜

董辅初

曾启贤同志不幸早逝, 至今已 10 年。亲朋去世都令我心痛, 曾启贤同志的去世令我尤为心痛。时至今日已过去 10 年, 每每想起他的去世或与人谈起他的去世, 我仍如最初听到他不幸去世的噩耗时那样, 十分心痛。这不仅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位挚友, 而且异常惋惜我国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

我与曾启贤都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 都师从张培刚老师。但他毕业于 1945 年, 而我在 1946 年才入学。我入学时, 他已经是二年级的研究生了, 导师是张培刚, 而张培刚老师则教我们一年级的经济学(以及二年级的经济思想史)。曾启贤的妻子丁莹当时是教我们的会计学的戴铭巽教授的助教, 所以是我们的老师。大学毕业前, 我与曾启贤没有多接触。1950 年我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曾启贤成为我的同事。那时, 我任武大教工党支部书记和武大党总支委员, 一度负责全校教职员工的党的工作, 与许多教职员工有往来, 同时我又在经济系工作, 与曾启贤自然也就接触多了。不久, 即 1952 年我离开武大, 先到北京进修俄语, 接着 1953 年去苏联作了四年研究生, 1957 年回国后又回到武汉大学任讲师, 直到 1959 年初正式调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应该说, 我与曾启贤的学术交往是从 1957 年开始的。但来往更频繁是文革以后。我们一起参加过一些学术会议, 共同编《大百科全书·经济卷》的总论部分, 两次一起出国访问。第一次一起出国是在 1980 年, 参加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到美国参加研讨会并访问, 第二次一起出国是 1987 年初, 到法国参加研讨会并访问, 在这两次访问期间我们谈得很多。谁知第二次出国回来, 未隔多久, 即 1988 年他就患病去世了, 而且

患的并非不可救药的肺部炎症, 能不悲乎! 他不幸去世后, 我写过一篇悼念的文章, 发表于《经济学周报》(1989 年 5 月 14 日), 但仍不能消去心中的悲痛。

曾启贤的经济学根底很深很厚。大学和研究生期间, 他对西方经济学下过一番苦功夫, 特别是对马歇尔、凯恩斯和希克斯的经济理论下过很大功夫, 学习钻研。解放初他曾到中国人民大学作研究生, 对马克思的经济学也下过很大功夫, 学习钻研,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的经济学虽是对立的, 但研究的对象却是共同的, 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场经济, 只不过前者研究的是在市场经济中如何优化资源的配置, 而后者研究的是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家与工资劳动者之间的生产关系; 二者在理论方面都源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因此, 曾启贤可以将二者贯通起来。象曾启贤这样在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方面都下过很深的功夫的经济学家, 在我国为数甚少。我自己就不能望其项背,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我都学过, 但都未下过深功夫。曾启贤是我国国内少有能深入经济学堂奥, 并能将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融会贯通的经济学家。记得 1980 年我们在美国参加《中美经济学家经济发展战略抉择研讨会》, 到会的美国的(也有几个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都是当今美国顶级的经济学家, 其中包括刘易斯、阿罗、舒尔茨、钱纳里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谈的是当时前沿的经济理论, 特别是发展经济理论。那时, 我国刚刚开放, 我国经济学家对西方当代的经济理论很不了解, 与他们对话是有困难的。曾启贤因为有以前的西方经济学的功底, 他很容易地就进入了对话。在这次会

议和在美国一个月的访问中,由于他吸收得快,他的收获也最多。第二次我们去法国开会,会上的讨论涉及到西方经济学中的非均衡理论,有几位西方著名的非均衡理论的权威经济学家如法国的贝纳西等,曾启贤是我方经济学家中能与他们讨论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改革开放前,封闭的环境,使我国经济学家与国外经济学的发展隔绝了多年,曾启贤也是这样。改革开放使我们与国际的接触和交往多起来了。对于一些青年人来说,他们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新理论困难较少,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经济学家来说,如果没有以往的西方经济学的根底,虽然与外界接触多了,但仍无法吸收其新发展的理论。在改革开放后有了重新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的机会,曾启贤如饥似渴地学习,很快地补上了多年隔离形成的知识空缺,向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前沿接近。这在我国年长的经济学家中也是极少有的。

曾启贤的经济理论著述不多。在他去世后,他的学生为他编了一本文集,这是他唯一的一本问世的书,其中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而客观原因是主要的。客观原因是,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没有自由思考、独立研究、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的环境,改革开放前,经济方面的文章著作少得可怜,而且大多是对政策的解释,没有是非标准,政策变了,论述也变了,而且只能谈经济建设的成就,不能研究和讨论经济中的问题。在这种“高气压”的环境下,人们为免惹是非,少说为佳,怎么会有许多经济学的论文和著作呢?又怎么会有高质量的论文和著作呢?主观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曾启贤学识严谨,没有成熟的见解不轻易落笔,文章写成后还得再三推敲,自己不满意,绝不出手。我知道,他在经济理论方面有许多想法,但想得得多,讲得少。而写的又比讲的还少。治学严谨自然是值得提倡的优良学风,但曾启贤可能过于谨慎,致使他的许多闪烁着光辉的理论见解,没有公诸于世并流传后世,这是十分可惜的;另一个方面是曾启贤为人胆小。历次运动使他更加谨小慎微,他出身富绅家庭,成份已属不好,又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显然已入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另册。他能躲过历次政治运动的风浪与他胆小怕事有很大关系,而多次政治风浪又使他更加胆小怕事,谨小慎微。本来理论研究要求独立思考,大胆创新,胆小怕事,谨小慎微压抑了他的理论勇气,摧残了他的创新精神。尽管如此,但如果存在一个鼓励独立思考,大胆创新的学术环境,也不致到不敢着笔的地步。谓予不信,请看看曾启贤的文选收入的文章都是改革开放后政治环境逐渐宽松后写的,这就足资证明。这

也是我为他心痛,为他惋惜的原因。我常想,如果他能不早逝,别说更长远,仅仅这10年,他应该能写出多少有份量的经济学论文和著作。特别是我们回头看看他的几篇力作,如论经济人、论资源稀缺性的文章,都是他去世前不久发表的,那时他刚刚进入创作的高峰期(虽然这高峰期来得太晚了),可是谁能想到他的自然生命和学术生命倏然中断了。

曾启贤长期在武汉工作,那里的学术环境远不如北京。北京地处政治的中心,容易触及时代跳动的脉搏,而且有一大群经济学家,容易互相切磋,这对于从事经济理论的人来说,在北京工作是幸运的。曾启贤没有这样幸运,武汉也有一批经济学家,但比起北京就少得多了,信息也不及北京灵通,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那里“左”的流毒远甚于北京。可以想象曾启贤在那里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有多么艰辛。他那样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仍不免遭到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攻击,更可见他的工作之艰辛。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在经济理论的探索方面,在武汉他虽然不能说是孤军奋战,但战友和知音是屈指可数的。他去世于1988年,与“六四”毫无干系,而在“六四”后,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他成了“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成了“划线”的坐标,连与他亲近的、在理论上与他共鸣的学生、朋友,也不为人所容。那时我想,幸亏他早去世了,否则他一定要吃苦头了,胆小怕事使他躲过了多次政治风波,这次可躲不过去了。所幸这次“左”潮很快就退了。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拨正了改革的航向,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了,回头看,曾启贤在去世前论述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的一些力作更加展现出理论的光辉,人们更加认识到他的理论功底和学术成就。曾启贤懂得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西方经济理论本可大显身手的,但却早逝了。在中南地区的经济学界,继卓炯同志去世后,他的去世是另一颗耀眼的明星的陨落。他们去世所带来的损失,至今我们还可以感觉到,因为在中南地区象他那样在研究基本理论和现实经济方面有全国影响的经济学家是屈指可数的。但愿他们去世所留下的一个空缺能早日得到弥补。

1998年6月17日于北京飞往美国的途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责任编辑:曾国安)